

# 从互文性看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社会心理趋向

吴非 张文英\*

(哈尔滨理工大学 哈尔滨 150040)

**提 要:** 翻译是一种互文性的跨文化交流,不仅是互文性视角下文本信息的再现过程,而且是一种社会活动,与译者的社会心理活动联系密切。自翻译研究与互文性理论结合以来,翻译研究的互文性打破传统翻译研究的封闭模式,视角再次转移到翻译多重主体之一的译者身上。本文从互文性理论和翻译心理学视角研究并揭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社会心理趋向,分析影响译者社会心理变化的因素以及译者的心理活动对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的影响。

**关键词:** 互文性; 翻译心理学; 译者心理许多趋向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6)04-0130-4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4.029

##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ors'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Tre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textuality

Wu Fei Zhang Wen-ying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150040, China)

Translation is an intertextual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t refers not only 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source-text in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textuality, but also a social activity which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mental activities of the translators. Since the combina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 intertextuality, the traditional closed stat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been broken, so that the attention is turned back to the translator again, who is one of the dual subjects of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intertextuality and translation psycholog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and discover translators'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trend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And it also analyzes many factors that affect translators'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s, and how translators' mental activities impact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ranslation outcome.

**Key words:** intertextuality; translation psychology; translators'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trends

### 1 翻译的互文性与译者的心理趋向

#### 1.1 解读互文性理论

互文性理论是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朱丽娅·克里斯蒂娃首先提出“互文性”理论,她指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Kristeva 1986: 37)。每一个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镜子,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

翻译过程涉及两种文本的参与:一个是原文本,另一个是目标文本。这两种文本可以是同一个地域不同时期

的语内翻译,也可以是不同地域的语际翻译。就翻译本身而言,无论从表象上看还是从本质上来看,都具有互文特征。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在它以前文本的遗迹或记忆的基础上产生的,或者是在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中形成的(Kristeva 1986: 37)。秦文华认为,“互文性强调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相指涉、感应、接触、渗透、转移等作用,它关注的是文本的非确定性和非中心性”(秦文华 2006: 37)。译者作为文本翻译的中介是传递信息必要的和不可或缺的桥梁。翻译能够使不同文化社团的成员进行交流,消弭由于文化环境不同所造成的言语/非言语行为、期望、知识与观点等方面的隔阂,使信息发出者与接受者

\* 张文英系本文通讯作者。

能有效地进行交际。

### 1.2 解读译者的心理趋向

林语堂说,“其实翻译上的问题,仍不外乎译者的心理及所译的文字的两样关系,所以翻译的问题,就可以说是语言文字及心理的问题”(林语堂 2004: 287)。武景全认为翻译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自然也受翻译主体即人的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的支配和控制(武景全 1999: 7)。

互文性通常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包括(1)两个具体或特殊文本之间的关系;(2)某一文本通过记忆、重复、修正,向其他文本产生的扩散性影响。因此,从原作到译作,译者在互文关系中具有主体身份,起着最积极主动的作用。一方面,译者要充分了解原作的意图,忠实地把它传达出来;另一方面,则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对原作的再创造。“翻译者在将一个异域文化的话语所包含的观念引入本土时,必然会对这来自异域文化的价值观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然后决定转达的策略是直截了当,还是曲达其义;是‘剜鼻削眼’,还是另起炉灶。”(王东风 2003: 17) 翻译不仅是一般性的语言符号间转换的结果,同时还是一种解释性的再创作过程。因此,目标文本能否表达出原文本同样的信息,译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译者作为原作的再创造者,在翻译中必然有自己的心理活动,这些心理活动对翻译的过程和翻译的结果必将产生影响(侯雅楠 董广才 2007: 141)。

### 1.3 从互文性视角看翻译

传统翻译研究不注重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忽略译者内在的文学修养、个人经历、思维方式、文化程度以及外在的国家历史、社会文化、教育背景、生活历练等互文性要素。对译文中的“创造性叛逆”不加分析地加以贬斥,使译者处于尴尬地位。互文性理论使翻译界对译者的作用重新定位,并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译者身上。

互文性的翻译研究将翻译从文本与文本引向文本与读者、文本与译者,也引向文本、作者、读者、译者与文学、与外部社会历史语境的对话之场(秦文华 2006: 37)。因此,参与翻译活动的主体——作者、译者和读者都活跃在互文运动的场中,穿行在数不尽的文本之间。作者创作之初也是前人文本的读者,在前人文本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并在前作者的影响下写作。所以说任何作者都是从读者转换过来,从来没有接触任何文本的人根本不能从事写作。译者在翻译文本之前,首先是原文本的读者,要对原文本有所了解,具备一定的相关知识,从原文本的语言、文化内涵等方面深刻透彻地理解原文本。同时还要对原作者进行一定的研究,例如其生活观念、语言特点以及作品的艺术特色,等等。除此以外,译者自身还要具备足够的、丰富的与原文本相关的知识结构和信息体系。译者与原作者的互文知识越多,译者对作品的理解越深刻,译著也会越接近原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原作

的特殊互文本。

## 2 从互文性视角解读译者的社会心理趋向

### 2.1 互文性文本中社会文化差异因素对译者的影响

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跨文化语言交际活动,也是一种文化互文性和译者心理相结合的产物,要从文化互文性和译者心理的角度去研究。译者是这种跨文化翻译交流的纽带、桥梁。特定的社会文化产生独特的思维意识;不同的思维方式又影响不同民族的心理活动。“这种民族心理的差异,在潜移默化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形式、情感表达、语言习惯和行为方式,等等”(万玉兰 2007: 182)。

不同的译者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致使相同文本有不同的译法。以《红楼梦》的书名翻译为例,其翻译涉及社会文化的互文性,其中争议最大的是“红”的译法。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中,红色代表吉祥、喜气、热烈、奔放、激情、斗志、革命等。比如在中国古代,许多宫殿和庙宇的墙壁都是红色的,宫邸、服饰的颜色多以大红为主,即所谓“朱门”、“朱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行中的火对应的颜色是红色,八卦中的离卦也象征红色。而《红楼梦》的“红楼”和“朱门”一样,是古代王侯贵族住宅的代称。不言而喻,“红楼梦”是说红楼贵族的显赫无非南柯一梦。因此,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为 *A Dream of Red Mansions*。然而,在西方的社会文化中,红色是邪恶、残暴、流血、紧张、危险和淫秽等贬义的代表词。例如, *a red adventure story* (一个令人紧张的冒险故事)。所以,著名汉学家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正是意识到英语读者不具备 red 一词在中国文化中的互文知识,英语读者可能会联想到西方社会文化中 red 一词的上述贬义,所以他译为 *The Story of the Stone*。两种译法的区别在于前者本身是中国人,传统文化修养极高,能够深刻地体会并理解该书表达的内涵;而后者是西方人,他考虑的是屈从英美读者的阅读习惯,忽略对中国文化的诠释。翟玉捷(2009)认为,任何一个文本的形成都不是孤立的,它总是融入在一个民族的文学、历史、传统和习俗等诸多因素之中。在互文性思维方式的启发下,对文学的解读是一种互文性的解读,对翻译的分析也是一种互文性的分析。

### 2.2 互文性文本中宗教文化差异对译者心理的影响

“宗教对人们的价值观具有导向作用,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及行为习惯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张迎春 2010: 166) “在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道教和佛教思想为辅的三大宗教文化有着广泛的影响。而基督教文化和西方哲学则是构成英语国家传统宗教文化的主体。这种宗教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语言含义的表达。”(李小园 2008: 13) 基督教是西方特有的一种宗教,许多中国人都不具有这种宗教背景的互文要素,在进行跨文化交流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英

语很多的词、短语表示特定的宗教意义,不具有该背景互文知识的人只按字面理解,会产生错误的联想。例如, End of the World(世界末日),宗教信仰不同的民族对其理解大不相同。深受儒教与佛教虔心向善说的影响,中国人可能理解为大难临头、人类即将毁灭的恐怖时光;而对于受基督教“原罪说”影响的西方人来说,它并无恐怖之意,只表示伸张正义的时刻。“英语中有许多涉及宗教活动、仪式等的词汇,它们都代表特定意义,简单译成汉语,往往不能传达该词的全部含义。”(王天枝 2008: 340)因此,在翻译带有特定宗教文化内容的文本时,译者与原文作者有没有宗教文化互文知识就会起重要作用,它控制译者的心理走向。只有深刻了解东西方宗教文化的差异,理解语言中的宗教文化内涵,才能避免误译。

2.3 互文性文本中思维方式差异对译者的影响

人的认识、情感、意志3方面的心理活动,从其活动结构和发生机制来看,具有共性,都受共同的规律制约。但是,心理过程表现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又不会完全一样。这是因为人的心理过程在不同的生活实践中会受到差异规律的制约,从而表现出个人心理的不同倾向和特点。不同译者就同一原文本会创作出不同文本的译作,个人的社会心理因素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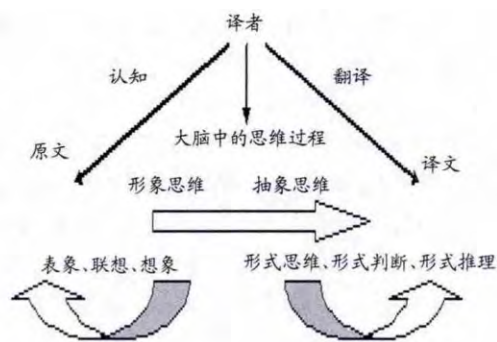


图1 译者认知过程图

我们不难发现,导致译文文本不同的主要原因是译者思维方式的不同。思维方式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其深层的表现有情感、意志等暗流及更深的以潜意识存在的观物态度,而其浅层的表现则为语言。东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呈圆形,以直觉体验为工具,强调整体性;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呈线形,以逻辑实证为手段,强调部分分析。陈宠薇(2004)提到,中国人重直觉与具体,而西方人重理性与逻辑。中国传统思想注重实践经验和整体思考,善于借助直觉体悟、直觉思维,强调感性、灵感和顿悟;而西方人重视理性知识、分析和实证。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在语言上表现为汉语的形象性和英语的功能性。

2.4 互文性文本中地理文化差异对译者的影响

翻译不仅涉及语言的转换,有时还涉及信息发生的

地理环境和情景的转换。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看,它是两种地理文化信息间的转换,而这种信息转换又靠语际间的转换进行。语言文化所处地域和自然环境的不同,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种现象或事物采用不同的言语表达形式。跨文化交际学表明,特定的生长环境使人们养成特定的思维定势,多数人类学者、社会学家都认为一个国家的地理条件在不同程度上对文化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西方文化发源于希腊神话,而希腊是个岛国,首先建立较民主的契约社会。又因为大部分活动在海上,养成好“动”的取向,求变、好奇成为海洋文化的特点,也养成好“动”的民族性格和人生观。地理文化的差异导致东西方人的物质观存在区别。例如,五行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物质观,多用于哲学、中医学和占卜方面。它包括木、火、土、金和水5种物质。而西方只讲4大元素,4元素说是古希腊关于世界的物质组成学说。如果遇到有地域文化歧义时,译者应从互文性的视角并站在目标读者的角度进行翻译以消除文化差异。“五行”应该翻译成 the five elements,并且对其进行相应的解释: The five elements (metal, wood, water, fire and earth, held by the ancients to compose the physical universe and later us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explain various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phenomena)。

2.5 互文性文本中性别心理差异对译者心理的影响

语言中性别差异体现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邱芬(2009)认为,随着女权主义思想和女性文学的普及和蔓延,男女译者在翻译中会遇到一系列技术性的问题:如何将原文中带有女权色彩或含有特殊文化意义的词汇原汁原味地转移到目的语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在涉及到异域文化中性别问题时,译者在阅读和阐释中可能首先对同性作家的作品有更多的认同感。而且,对女性主义有所了解的女性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也体现出其性别意识。西方女性主义强调自主意识和个人意识,显示较强的个性化特征。中国女性由于长期受到封建制度的禁锢,女性自我意识的发现是朦胧的、盲目的和时断时续的。

下面,以《紫色》的3种译本为例分析不同性别的译者在处理原文本中性别意识上的差异。例如:

① She has the nerve to put one hand on her naked hip and bat her eyes at me. /陶洁:她居然敢把一只手放在光屁股上对我飞个媚眼。鲁书江:她满不在乎地把手搭在她那光光的屁股上冲我眨了眨眼。杨仁敬:她厚着脸皮把一只手放在光屁股上,还对我挤眉弄眼。(李红玉 2008: 22)

在前两个译文中,译者使用“居然敢”和“满不在乎”这样的中性词,表达出西丽对莎格行为的惊讶语气。这也是因为译者观察到西丽对莎格夸张行为的诧异和羡慕;而第三位译者使用贬义词“厚着脸皮”和带有反感的词组“对我挤眉弄眼”以表达译者本人对莎格的厌恶。译

文没有将西丽的真实感情表达出来,反而代替作品中的人物掺杂个人情感因素。因此,在文本翻译中,译者的性别心理差异因素对译文具有创造性叛逆的再创作影响,其性别意识在目标文本中也有体现。

#### 2.6 互文性文本中审美意识形态对译者心理的影响

中国审美意识的特点是以味觉、触觉和嗅觉作为感知方式的原型。西方审美意识对于视、听、嗅、味和触5种感官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断裂和等级倾向,扬前者而贬后者。视、听被认为是接近心灵的“理论感官”,嗅、味、触则被视为动物或官能性的感官。这种等级制说明西方审美意识具有一种尊心灵、精神而贬肉体、物质的价值观。中国审美意识不但不特别强调视、听反而以更基础的味、触、嗅为原型,认为“五色令人目盲”、“圣人为腹不为目”、“是以大丈夫……处其实,不居其华”。中国式的以嗅、味、触觉为原型的审美意识也因其感知方式与感知对象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溶为一体的关系和形态,故而预设某些内在的美学价值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孙诗谦 2010: 89)。中国文化个性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讲究含蓄(不张扬)、圆融(在一个圈里转)。这种特点进一步影响中国的审美和文化心理。在审美上,女性行为讲究“笑不露齿”的含蓄美。在文学译著《海军密约》中,性格坚强、相貌“醒目”的西洋美人被创造性地改造成中国古典美女。例如:

② She was a striking looking woman, a little short and thick for symmetry but with a beautiful olive complexion, large dark Italian eyes, and a wealth of deep black hair (Conan Doyle, *The Adventure of the Naval Treaty*). / 安娜貌颇丽,肤色雪白,柔腻如凝脂,双目点漆,似意大利产。斜波流媚,轻盈动人,而卷发压额,厥色深墨,状尤美观。形体略短削,稍嫌美中不足。(《海军密约》,黄晓雄 2007: 55)

为了让该作品中的女人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心理,容易让目标文本的读者接受和喜爱,译者将对西方女人外貌特点的语言描述转变成对东方女人特有性格的描述。但正是由于译者缺乏对西方审美文化的互文知识,所以对原文进行重新的“塑造”使西方社会独具的审美文化特征失去应有的特点。

### 3 结束语

自翻译研究与互文性理论相结合以来,翻译研究的互文性打破传统翻译研究的封闭模式,视角再次转移到翻译多重主体之一的译者身上。本文从互文性视角探讨译者在翻译有文化差别的文本时影响译文本变体的译者自身的个人心理因素和一些不可避免的社会心理因素。因为翻译研究离不开对译者的心理活动研究;翻译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涉及到译者的语言心理、审

美心理和文化心理。通过以上的分析,值得肯定的一点是:由于译者的心理活动具有多重性特征,因此,对译者心理活动的研究也应该从多层面展开。

#### 参考文献

- 陈宏薇. 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侯雅楠, 董广才. 论心理因素与翻译活动的相关性[J]. 大连大学学报, 2007(4).
- 黄晓雄. 浅谈意识形态对翻译中文化信息流失的影响[J]. 南昌工程学院学报, 2007(4).
- 景全. 翻译心理研究:目的、课题、方法[J]. 上海科技翻译, 1999(2).
- 李红玉. 译者的性别意识与翻译实践——谈性别视角下的《紫色》四译本[J]. 中国比较文学, 2008(2).
- 李小园. 中西文化差异与翻译[J].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08(4).
- 林语堂. 论翻译[A]. 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 秦文华. 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邱芬.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浅析男女译者在翻译中的差异[J]. 魅力中国, 2009(10).
- 孙诗谦. 从审美意识的形成看中西文化差异[J]. 大众文艺, 2010(21).
- 万玉兰. 从心理文化的视角看译文信息的差异[J]. 江西社会科学, 2007(12).
- 王东风. 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 中国翻译, 2003(9).
- 王天枝. 文化差异与翻译——宗教文化与翻译[J]. 安徽文学(评论研究), 2008(5).
- 翟云捷. 翻译文学中译者的双重文化身份——《红楼梦》两种英文译名[J]. 考试周刊, 2009(4).
- 张迎春. 从跨文化的视角看宗教文化与翻译[J]. 黑龙江科技信息, 2010(1).
- Kristeva, J.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A]. In: Moi, T. (Ed.), *The Kristeva Reader* [C].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Ltd., 1986.
- Zhang, M.-F. Investigating Functions and Translations of Public Notices [A]. In: Salmi, L., Koskinen, K. (Eds.),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Congress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nslators XVII* [C]. Paris: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nslators, 2005.